

## 说 《说苑》

范能船

《说苑》是我国古代文学宝库中的珍贵遗产之一。

早在东汉时代，班固已发现这一点。他说：“及采传记行事，著《新序》、《说苑》凡五十篇，奏之。数上疏言得失，陈法戒。书数十上，以助观览，补遗阙。上虽不能尽用，然内嘉其言，常嗟叹之。”（《汉书·卷三十六·楚元王传第六》）可见著《说苑》“言得失，陈法戒”“助观览，补遗阙”是有效果的。所以不少史书，例如《汉书·艺文志》、《隋书·经籍志》、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、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、《清史稿·艺文志》等，都将《说苑》载入史册，流芳于后代。

同时，历代还出现了各种版本。例如宋代有咸淳本，元代有元刊本、元刊大字本、元刊麻沙小字本，明代有正德本、嘉庆本、万历本、景万历本，清代有乾隆本、景乾隆本、嘉清本，近代有四部丛刊本等。不仅引起历代重视，而且还传播到国外，深得国外重视。例如日本就有新刊纂注本、宽政六年兴艺馆刊纂注本（以上均见邵懿辰撰、邵章续录《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》、上海图书馆编《中国丛书综录》第二册）。

除有各种版本外，有的还续写《说苑》，如《宋史·艺文志》记云：“刘颙续《说苑》十卷。”有的对《说苑》进行校补，如《清史稿·艺文志》记云：“《说苑》校补一卷（卢文弨撰）。”而据《清史稿·卷四百八十一·儒林二》记载：“文昭孝谨笃厚，潜心汉学，与戴震、段玉裁友善，好校书……文昭校书，参合各本，择善而从之，颇引他书改本书，而不专主一说……”有的还作读书心得，如《清史稿·艺文志》记云：“读《说苑》一卷（俞樾撰）。”而按《清史稿·卷四百八十二·儒林三》记载，俞樾是清代专治经学，主讲紫阳书院、杭州诂经精舍，自少至老著述不倦的大学问家。

为什么历代如此重视《说苑》？决非出于偶然，这是因为《说苑》本身具有重要的价值。关于这一点，早在齐梁时代，刘勰在《文心雕龙》中就有精辟的分析。刘勰云：“……若夫陆贾《典语》、贾谊《新书》、杨雄《法言》、刘向《说苑》、王符《潜夫》、崔寔《政论》、仲长《昌言》、杜夷《幽求》，咸叙经典，或明政术；虽标论名，归乎诸子。何者？博明万事为子，道辨一理为论。彼皆蔓延杂说，故入诸子之流。夫自六国以前，去圣未远；故能越世高谈，自开户牖。两汉以后，体势漫弱；虽明乎坦途，而类多依采。此远近之渐变也。嗟夫！身与时舛，志共道申，标心于万古之上，而送怀于千载之下。金石靡矣，声其销乎！”（《诸子篇》）刘勰虽然指出：“两汉以后，体势漫弱；虽明乎坦途，而类多依采，”但对《说苑》一类书是热情肯定的，至少有二点肯定无疑。（1）从思想内容的广泛性而言，认为《说苑》等书，“彼皆蔓延杂说，故入诸子之类”，即断定《说苑》等书，牵涉到各方面的问题，应该属于诸子的范

围；因此，在刘勰看来，《说苑》一类书，实际上是先秦诸子散文的延续，这就从根本上肯定了《说苑》的地位。（2）从地位作用和对后世的影响而言，肯定《说苑》一类书，和先秦诸子一样，“标心于万古之上，而送怀于千载之下。金石靡矣，声其销乎！”在刘勰看来，《说苑》等书是承“万古之上”，启“千载之下”，而犹如金石万古长存的。事实正是如此，《说苑》不但在当世发生了影响，如班固所言：“上虽不能尽用，然内嘉其言，常嗟叹之”；而对后世也发生了深远的影响。例如明太祖（朱元璋）洪武十五年（公元1382年），国家颁发《说苑》，要求天下学校对学生讲读《说苑》（据邵懿辰撰《邵章续录·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》记载）。刘勰对《说苑》等书的分析评价是恰如其分的，他使我们从理论的高度，认识《说苑》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宝贵的精神财富，从而理所当然地给以充分地重视，并切实地开展研究工作。

## 二

从结构上看，《说苑》眉目清晰，共分二十卷，即依次分君道、臣术、建本、立节、贵德、复恩、政理、尊贤、正谏、敬慎、善说、奉使、权谋、至公、指武、谈丛、杂言、辨物、修文、反质等二十卷。每卷之下再分章，按曾巩《说苑·序》称：“凡二十篇，七百八十四章……”其实，细加整理可分为678章。

从内容上看，一般采取《崇文总目》的说法：“所载皆战国秦汉间事。”直至当代新编《辞海》还沿用这种说法，“《说苑》，书名，西汉刘向撰，原二十卷，后仅存五卷，经宋曾巩搜辑，复为二十卷，内容分君道、臣术、建本、立节等二十门，分类纂辑先秦至汉代史事，杂以议论，借以阐明儒家的政治思想和伦理观念。”笼统而言，这种说法当然不错；但总嫌太粗。纵观全书，其实绝大多数是先秦的事，而汉代的事极少。诚如余嘉锡遗著《四库提要辨证·新序十卷》所云：“以今考之，春秋时事尤多，汉事不过数条。”确实如此，如果把全书细分成678章，其中先秦时事662章，而秦汉时事16章，所以确切地说，《说苑》一书所载大多为先秦时事，极少量为秦汉时事。

《说苑》所叙事，虽有些内容与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等书籍有些出入，但就其总的思想倾向而言，是有其不朽的价值的，正所谓“标心于万古之上，而送怀于千载之下。”如《君道》中所宣扬的“务在博爱”、“布德施惠”、“利归于民”、“知人任贤”、“文武俱行”、“敬慎恭己”、“广开耳目”、“出举远方”、“从谏如流”、“过而改之”等观点，《臣术》中所阐述的“必有益于国，必有补于君”等观点，《建本》中所论述的“君子务本，本立而道生”、“有正君者无危国”、“多闻而择”、“一性止淫”、“常为而不置”、“有国者不可以不学”、“君人者以百姓为天”、“富之乃治国之本”、“板筑以时，无夺农功”等观点，《立节》中所表述的“卑贬贫穷非士之耻”、“义之不立，名之不著是士之耻”、“君子当功以受禄”、“轩冕在前，非义不受；斧钺在后，义死不避”、“去国归敌，非忠臣”等观点，《贵德》中所称颂的“国之宝在德不在险”、“为人君者明贵德而贱利道下”、“仁者爱人”、“上下同乐”、“爱老长幼”、“老弱有养”、“鳏寡有室”、“不误民时”、“释台罢役”、“羞言利民”等观点，《复恩》中所赞颂的“树德除怨”等观点，《政理》中所表彰的“王者之政化之”、“化之为贵”、“审择左右”、“择能而使之”、“使民富且寿”、“化其心莫若教”、“任人而治”、“上陈之教而先服之”等观点，《尊贤》中所论颂的“审己而任贤”、“一节见则百节知”、“亲仁而使能”、“尊贵而贱不肖”、“慎毋以

士之所羞者骄士”等观点,《正谏》中所推崇的“君失之,臣得之;父失之,子得之;兄失之,弟得之;夫失之,妇得之;士失之,友得之”、“忠臣之言不可不察”、“治天下者非用一士之言”等观点,《敬慎》中所赞美的“日夜慎之则无灾害”、“存亡祸福其要在身”、“君子能慎其独”、“得其所利,必虑其所害;乐其所成,必顾其所败”、“位已高而意益下,官益大而心益下,禄已厚而慎不敢取”等观点,《善说》中所主张的“辞不可不脩,而说不可不善”等观点,《奉使》中所称道的“救危除患”、“安社稷,利国家”、“虽死无二”等观点,《权谋》中所提示的“圣王之举事,必滞之于谋虑”、“人主之务,在善听而已”等观点,《至公》中所力述的“不以国私身,捐千乘而不恨,弃尊位而无忿”等观点,《指武》中所阐明的“当吉念凶,存不忘亡”、“先文德而后武力”、“道尊然后行”、“内治未得,不可以正外”、“将有死之心,士卒无生之气”等观点,《谈丛》中所阐发的“君子不羞学,不羞问”、“谋先事则昌,事先谋则亡”、“福生于微,祸生于忽”等观点,《杂言》中所杂论的“见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”、“君子不急断,不意使”、“知之为知之,不知为不知”等观点,《辨物》中所讲述的“薄赋敛,无费民”、“圣王就其势,因其便,不失其性”等观点,《修文》中所提出的“功成制礼,治定作乐”、“天子辟雍,诸侯泮宫”等观点,《反质》中所揭示的“君子以德华国”、“以俭得之,以奢失之”等观点,在当时历史条件下,皆有着丰富的人民性,包含着许多民主性精华。在刘向看来,缓和统治阶级和广大人民之间的矛盾、解决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,主要靠最高统治者及其周围的臣子,所以把“君道”、“臣术”放在第一、第二两卷来编撰,而且以下各卷,也或明或暗地突出了“君道”、“臣术”的关键地位,它似一条纲网络全书。当然光靠皇帝和群臣还不够,因而接连提出“建本”、“立节”、“贵德”、“复恩”、“政理”、“尊贤”等等一系列政治思想和伦理观念。刘向所宣扬的这一整套政治思想和伦理观念,基本上是儒家思想的反映;而儒家思想在当时来说,对缓和统治阶级和人民之间的矛盾,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作用是很大的。因此这是符合人民群众愿望的,也是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的。《说苑》所以能“标心于万古之上,而送怀于千载之下”,正由于其包含着丰富的思想价值。

当然,刘向无疑是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来宣扬这些观点的,他的出发点是为了挽救封建汉皇室的覆没的命运,就是为了维护和巩固刘氏的政权。这一点阶级本质是肯定无疑的。况且,刘向是元、成之间谈符瑞灾异的代表人物,五行家的思想也必然掺杂到《说苑》中来。特别在《辨物》一卷,充塞着这种说教。他把自然界的妖祥和政治上的得失联系起来,这一种唯心主义思想意识,尽管刘向别有用意,但就其思想体系而言,终究是一种唯心的落后的意识形态。这与早在战国时荀况提出的“天行有常,不为尧存,不为桀亡”的唯物宇宙观更不能同日而语。总之,在充分肯定《说苑》的思想价值的同时,对其思想上的某些明显不足也不可忽视。

### 三

《说苑》不但在思想内容方面有其价值,而且在表现形式方面也不失为上乘。就这方面而言,也诚如刘勰所评价,即“越世高谈,自开户牖”。

《说苑》在表现形式上,大体上有四个特点。

其一,以历史故事为主,杂以议论,使得历史故事,既有其生动性,又有其明确的主题,从而将叙事和议论完美地结合在一起。例如第一卷《君道》首章——

晋平公问于师旷曰：“人君之道如何？”对曰：“人君之道清静无为，务在博爱，趋在任贤，广开耳目，以察万方；不固溺于流俗，不拘系于左右；廓然远见，踔然独立，屡省考绩，以临臣下。此人君之操也。”平公曰：“善。”

在这里虽然没有完整的情节，而全是对话；围绕着晋平公的问话，师旷加以详尽的回答，最后点出晋平公赞许的态度；但是一问一答一点，十分紧凑，又非常生动，将为君的根本道理说得很精辟。作者的对为君道理的议论，就寄寓于晋平公与师旷的一问一答一点之中。更令人回味的是，这里所言的“人君之道”，不仅是首章的旨意，而且也是以下四十章故事的宗旨，可见其叙事和议论有机结合的精思博考。

其二，故事篇幅虽然短小，但表现手法多样，呈现出千姿百态的艺术形象。一般说来，《说苑》大多是篇幅短小，没有明确的故事发生的时间或地点，仅有简单的叙述、人物的对话，人物也往往只有姓名，性格较单纯，近于白描；但在艺术上却有着它自己的特点，这个特点就是体制短小而变化灵活。

有的全是对话，但在对话中展开情节，在对话中表现人物，在对话中展开主题。如第三卷《建本》有一章——

晋平公问于师旷曰：“吾年七十欲学，恐已暮矣。”师旷曰：“何不炳烛乎？”平公曰：“安有人臣而戏其君乎？”师旷曰：“盲臣安敢戏其君乎？臣闻之，少而好学，如日出之阳；壮而好学，如日中之光；老而好学，如炳烛之明。炳烛之明，孰与昧行乎？”平公曰：“善哉！”

有的要言不繁地叙述，在叙述之中勾勒人物的神态，透露人物的内心世界，十分逼真而传神。如第四卷《立节》有一章——

晋灵公暴，赵宣子骤谏，灵公患之，使鉏之弥贼之；鉏子弥晨往，则寝门闢矣，宣子盛服将朝，尚早，坐而假寐，之弥退，叹而言曰：“不忘恭敬，民之主也。贼民之主，不忠；弃君之命，不信。有一于此，不如死也。”遂触槐而死。

有的在对比之中，刻划人物的不同个性，从而更有说服力地表现故事的主题。如第七卷《政理》有一章——

宓子贱治单父，弹鸣琴，身不下堂而单父治。巫马期亦治单父，以星出，以星入，日夜不处，以身亲之，而单父亦治。巫马期问其故于宓子贱，宓子贱曰：“我之谓任人，子之谓任力；任力者固劳，任人者固佚。”人曰宓子贱，则君子矣，佚四肢，全耳目，平心气而百官治，任其数而已矣。巫马期则不然，弊性事情，劳烦教诏，虽治犹未至也。

有的因小见大，借题发挥，寓意极为深刻。如第十卷《敬慎》有一章——

孔子见罗者，其所得者皆黄口也。孔子曰：“黄口尽得，大爵独不得，何也？”罗者对曰：“黄口从大爵者不得，大爵从黄口者可得。”孔子顾谓弟子曰：“君子慎所从，不得其人则有罗网之患。”

诸如此类，枚不胜数，短小的篇幅，多样的手法，给人以玲珑剔透的艺术美感。

其三，除大部分有史实依据外，尚有部分包含丰富多采的想象和虚构的成分，因而极具寓言、神话传说的色彩。如寓言色彩很浓的，在第十一卷《善说》中有一章——

庄周贫者，往贷粟于魏，文侯曰：“待吾邑粟之来而献之。”周曰：“乃今者周之来，见道傍牛蹄中有鲋鱼焉，太息谓周曰：‘我尚可活也？’周曰：‘须我为汝南见楚王，决江、淮以溉汝。’鲋鱼曰：‘今吾命在盆甕之中耳，乃为我见楚王，决江、淮以溉我，汝则求我枯

鱼之肆矣。’今周以贫故来贷粟，而曰须我邑粟来也而赐臣，即来亦亦臣傭肆矣。”文侯于是乃发粟百钟，送之庄周之室。

神话传说色彩较浓的，在第十八卷《辨物》中有一章——

赵简子问翟封荼曰：“吾闻翟雨谷三日，信乎？”曰：“信。”“又闻雨血三日，信乎？”曰：“信。”“又闻马生牛，牛生马，信乎？”曰：“信。”简子曰：“大哉，妖亦足以亡国矣！”对曰：“雨谷三日，蚩风之所飘也；雨血三日，鸞鸟击于上也；马生牛，牛生马，杂牧也，此非翟之妖也。”简子曰：“然则翟之妖奚也？”对曰：“其国数散，其君幼弱，其诸卿货其大夫，比党以求禄爵，其百官肆断而无告，其政令不竟而数化，其士巧贪而有怨，此其妖也。”

其四，无论叙述语言、对话语言、议论语言，都简炼而传神，富有哲理的情趣，并籍以表现人物的品德和修养，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。例如第十四卷《至公》有一章如下——

吴王寿梦有四子，长曰谒，次曰余祭，次曰夷昧，次曰季札，号曰“延陵季子”，最贤，三兄皆知之。於是王寿梦薨，谒以位让季子，季子终不肯当，谒乃为约曰：“季子贤，使国及季子，则吴可以兴。”乃兄弟相继，饮食必祝曰：“使我早死，令国及季子。”谒死，余祭立；余祭死，夷昧立；夷昧死，次及季子；季子时使行不在。庶兄僚曰：“我亦兄也。”乃自立为吴王。季子使还，复事如故。谒子光曰：“以吾父之意，则国当归季子，以继嗣之法，则我适也，当代之君，僚何为也？”乃使专诸刺僚杀之，以位让季子。季子曰：“尔杀吾君，吾爱尔国，则吾与尔为共篡也。尔杀吾兄，吾又杀汝，则是昆弟父子相杀无已时也。”卒去之延陵，终身不入吴。君子以其不杀为仁，以其不取为义。夫不以国私身，捐千乘而不恨，弃尊位而无忿，可以庶几矣。

在这章故事中，有叙述语言，有对话语言，有议论语言，各具特色，完美结合。充分表现了《说苑》的议论文字实现了概括性和形象性的完美结合，并从中体现出哲理情味。

从上述四个特点来看，《说苑》确实有其独特的艺术风格。它分卷分章，眉目清晰；它叙议结合，形象深刻；它短小精悍，手法多样；它长于想象，富有文采；它语言形象，又具哲理等等。既不同于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等语录体，又不同于《荀子》、《韩非子》等专论体，它把叙事、写人、议论熔于短小的体制中，似为后代小说的滥觞。《说苑》的艺术价值，同其思想价值一样，是客观存在的，确实是我国古代文学宝库中的珍贵遗产之一，应予以充分肯定的。当然，《说苑》在叙事、写人、论说上究竟是较简单的，这同样是不容忽视的。但终究瑕不掩瑜，《说苑》作为自成一家的著作，不但在昨天应该受到重视，而且在今天仍然应该得到研究，愿其“标心于万古之上，而送怀于千载之下”之情，犹如金石长存！